

收稿日期:2024-03-02

女神的命运:基于中国神话重审坎贝尔女神观

姚梦婕^{1,2}

(1.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德语系,美国 加利福尼亚 94720)

摘要:约瑟夫·坎贝尔通过整理及归纳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神话、传说、故事及神圣信仰,详细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的女神神话变迁状况,即由诞生期、鼎盛期、衰落期及复兴期构成的总体不断演进的线性延展脉络。然而,社会、历史及多种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华民族极具个性的文化基因,中国女神神话的发展轨迹与坎贝尔的女神理论在宏观层面虽然基本相似,但二者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梳理从女娲、嫫祖、天女魃到西王母的神话叙事,可以看出,中国的女神神话发展并未完全遵循坎贝尔理论中所强调的“四期”演进,而是缺少鼎盛期的“三期”演进。因此,研究中国女神神话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坎贝尔理论进行拓展与完善,有益于人类从远古神话中汲取力量,认识自我和社会。

关键词:坎贝尔;神话;女神信仰;中国神话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4-0078-09

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23]49号)。

作者简介:姚梦婕(1996—),女,侗族,湖北潜江人,武汉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神话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4.048

约瑟夫·坎贝尔是二十世纪最为知名的神话学研究专家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神话学论著,如《千面英雄》《神的面具》《神话的力量》《千面女神》等。在这些研究论述中,坎贝尔始终致力于寻找全世界不同国家族群背后神话与神圣传统的共通之处。他承继了弗雷泽在《金枝》中的宏观人类学视角,兼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不断追寻人类在具体文化表现背后所共有的原始原型。直到1987年去世之前,他还在尝试建立古老神话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机制,努力使神话成为助力人类更好认识自我的精神桥梁。

作为一位男性研究者,身处男性力量更强大的社会体系内,坎贝尔并未忽视女性的神圣力量。相反,基于个人经历和研究兴趣,他的理论内部不时出现古老神话中不同女性神祇的身影。但是,作为一位西方传统学者,尽管坎贝尔以其广博的视野试图涉猎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古老神话,却仍旧由于语言、历史及文化所造成的种种屏障而未能考察中国古老神话中的女性神圣力量。本文试图以此作为切入点,指出坎贝尔在建构其女性神话理论的过程中,由于忽视对中国

女性神话的考察而产生的疏漏。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性别运动、女性主义思潮等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以神圣女性作为主体的神话叙事为当代女性争取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女性神话所象征的精神力量尚未引起坎贝尔以及西方世界其他女性神话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性别议题热潮已经成为一个普世性现象,不应该被禁锢在西方视角之内。通过比较中国女性神话与西方女性神话的异同,可以为女性神话超越国别与民族、跨越时间与历史、打破地域与文化隔阂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思考,也能更好地推进当今时代性别议题的讨论和实践。

一、坎贝尔关注女性神话的缘由

在《神话的力量》中,坎贝尔以3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克鲁马努人为例,指出克鲁马努人和今天的我们拥有着同样的躯体、器官以及身体能量。不论生活在纽约还是生活在洞穴中,人生历程基本相同,必定会经历幼年时的依赖期,进入成人的自我承担期,走入婚姻期,最后躯体衰老、逐渐失去体力而死亡^[1]。坎贝尔对远古人类成长过程的归纳较为简略,总体而言是为了打破原始与现代之间的思维界限,强调远古人类和现代人有着同样的身体和心理经验,在人类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促成了一种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永恒性精神,它在本质上超越了个人,象征和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命运,这种永恒正是来自于神话。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认为,神话定义了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历史传统,及其对宇宙万物的思考推演^[2]。简而言之,神话涵盖了一切在科技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的想象与创造。因此可以说,神话是人类精神现象的开端,是一切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之源。古老神话被改造成新型神话不断重现,始终都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坎贝尔认为,神话超越个体性别的限制,契合了从远古至今人类内在精神的成长过程,并在更为崇高的精神领域超越了人类的寿命限制,因此,自诞生以来,神话便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点在坎贝尔所撰《千面英雄》中得到呼应,在这一论著的结尾部分,坎贝尔从时间维度总结了人类通过神话方式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

对于远古时代的狩猎人类来说,剑齿虎、猛犸象和其他较少见的动物是主要的异类,它们既是危险之源,也是食物来源。当时人类的任务是与这些生物共享原始的大自然,因此他们的重要问题是在心理上与这个任务联系起来。由此发生了无意识的认同并最终导致了神话中有意识的半人半神的祖先图腾的出现。动物成为了人类的导师。……与之类似,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的氏族会把情感聚集在植物上,将种植、收获这类生活仪式等同于人类的生殖、出生和发展成熟的过程。然而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最终都会被纳入社会控制之下。因此有教益的神奇故事的领域转移到了天空,人类上演了有关神圣的月亮国王、太阳国王、僧侣的行星国家和调节世界的天体的象征性节日的伟大哑剧。^[3]

随着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断发生改变,现如今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不再是动植物和天外奇迹,而是人类自己。此后,科技文明的出现摧毁了旧时代,表面上看,人类不再相信神话,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当代神话的核心角色。现代人是未来人类的“祖先”,并将成为启示新时代的神话模型。人类该如何面对以人为主体的新神话,这与人类如何把握自我息息相关。对于这一话题,社会已经为男性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答案,因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神话大多是由男性经历和传达的。基于坎贝尔曾在莎拉·劳伦斯学院任教接近40年的经历,他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状况。当时劳伦斯学院还未成为男女混校,所以他的学生全部都是女性。经过与无数女性日复一日面对面的交流,坎贝尔产生了更多关于女性个人意识的见解。他认为,当今社会的女性个体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随着吸尘器等清洁工具的发明,女性从某种程度上开始缓慢摆脱家庭的束缚,逐渐“步入‘实现自我价值’的丛林之中”^{[4]3}。然而,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被男性统率了千百年,社会文化并未给女性提供属于她们的应对范式,今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需要重新面对性别话语开始产生变化的当代境遇,全人类都必须共同努力,耐心地协助女性成长。坎贝尔的女性神话理论重点在于探讨神话中蕴含的女性力量。女性神话不仅包含有关女神的神话,还涵盖了涉及普通女性人物的神话,人们从中可以窥见女性在特定文化中的价值和特定文化对女性的社会期望。而女神神话则专注于女神事迹的叙述,女神形象常与生育、丰收、战争、智慧等相联,代表自然力量或宇宙秩序,体现了对女性神祇的敬畏与崇拜。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构建了古代社会对女性力量的神圣化认知,也为现代女性主义提供了象征资源,展示了女性的权威与创造力。坎贝尔认为,探索女性神话可以为当代女性树立精神标杆。从1972至1986年,他发表了20余场关于女神的演讲(包括部分研讨会发言),探讨女神信仰的形象、功能、象征及其他相关主题^{[4]编者前言}。他认为,女性正处于从家庭中解放、进入社会谋求个人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面对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文化,女性应该学会及时提出自己的观念及见解,把握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必须澄清的是,女神信仰与女神神话密切相关但各有侧重。女神信仰更多强调宗教仪式与崇拜体系,而女神神话则更多关注故事叙述。两者在古代社会中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近年来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也重新受到关注与讨论。坎贝尔的女性神话研究从宏观角度涵盖了女性神话、女神神话和女神信仰等概念,虽然其理论存在某些意义建构不够清晰的缺陷,但也为以女性和女神为对象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凭借对世界各民族及国家神话中女神信仰的理解和领悟,坎贝尔指出,关于女性的神话早在关于男性的神话出现之前业已存在,只不过随着关于男性的神话不断繁荣而日趋衰落。在原始狩猎与采集阶段,负责狩猎的男性与负责采集的女性拥有相当的能力与地位。随着人类逐渐掌握培育植物与驯养动物的方法,女性神话开始崭露头角,即女神信仰诞生期。这一时期女性开始成为神话叙事的主体,男性则附属于女性。男性仍然是神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地区出土的陶塑中会呈现女人同时怀抱男人与孩子的造型^{[4]8}。人们重视的不再是狩猎与屠宰,而是种植与养殖^{[4]6}。女性与大地一样拥有生殖和养育的功能,看重土地的农耕文明,自然也会看重为耕种带来驱动力的母亲形象。因此,在坎贝尔看来,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文明的早期发展依赖大河灌溉,正是在此时期,女神信仰迎来了鼎盛期:人类赋予万物与女性互相联系的特征,这种大女神信仰影响着整个社会,自然也同时塑造了人类的行为模式。随后,由于闪米特诸族等游牧民族入侵了近东及古欧洲地区原始种植业者的文明,神话叙事中开始出现男性神祇斩杀大地女神的情节,女神神话缓慢进入衰落期。衰落期之后,神话叙事再次出现转折。崇尚武力的游牧文明在与农耕文明进行融合时,试图让他们代表战争和雷霆的男神迎娶农耕文明中的女神。这类婚姻关系使女神在文明发展中再次拥有力量,女神神话迎来了复兴期。

二、坎贝尔及其女神信仰发展观

在《千面女神》中,坎贝尔将女神信仰的衰落归因于来自沙漠的闪米特人及来自北方的印欧人分别对近东及古欧洲地区原始种植业者的征服。以两河流域为例,以游牧为生的阿卡德人(闪米特人的一支)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闪米特诸族的第二位圣王汉谟拉比统治期间,巴比伦诞生了太阳神马杜克的神话,马杜克击败了象征大地的原始女神提亚马特,该事件成为两河流域男神信仰取代女神信仰的转折点^{[4]12}。战争侵略者暴力摧毁了所到之处已有的文明,导致女神信仰逐渐式微。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一部分民族在利用雷霆手段攻占土地后,却选择以温和的方式让他们的神迎娶被征服的农耕民族的女神为妻,以此建立某种姻亲责任的联系,这其

中催生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以古希腊神话体系中赫拉与宙斯的婚姻为例,赫拉实际上是一位更早出现的女神,但在战斗民族占领希腊地区后,宙斯却作为主神迎娶了赫拉,使赫拉从自身拥有权力的全能女神转变为依附于宙斯的天后。此后,在古欧洲及近东的神话世界里,男神和女神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状态,坎贝尔将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成文及传播认定为女神信仰重盛的标志^{[4]167}。

坎贝尔认为,《伊利亚特》展现了由男性主导的印欧世界,《奥德赛》则带领人们走进了女神的世界^{[4]149}。《伊利亚特》以特洛伊战争作为背景展开,赫拉、雅典娜及阿佛罗狄忒三位女神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她们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进行裁决,最终帕里斯选择了阿佛罗狄忒,随后便是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诱拐,墨涅拉俄斯为了夺回海伦,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充满了来自男性的审视及追求:他们向往女人和战利品^{[4]151}。在帕里斯的裁决中,男性法则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女性的力量受到了压制。但到了《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被置于一种男女力量更为平等的适宜关系中。他所做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回家,不是为了某个婚姻关系之外的女人,不是为了追求战利品,而是返回自己的妻子身边。妻子佩涅洛佩是奥德修斯神话的另一面,这种男女两极间的和谐融洽,共同完善了奥德修斯的人生历程。在奥德修斯的船队被吹散后,他开始面临危机,从此进入神话的世界,所遇生灵都具有神话色彩,其中包括独眼巨人、卡律布狄斯、斯库拉和许多其他的怪物,此外还有喀耳刻、卡吕普索、瑙西卡。值得注意的是,喀耳刻、卡吕普索、瑙西卡都是女神^{[4]149}。在这里,中文版译者将坎贝尔在英文原版论述中所使用的“Nymphs”由“仙女”译为了“女神”,是因为坎贝尔在英文原版论述中对“Goddess”和“Nymph”的区分也并不明晰。译者领会了他的意图,用“女神”来表示一个包含全体女性神圣力量的广义概念。总体而言,她们最终指向的都是可以作为女性神话复兴象征的“女性法则”(Female Principle)与“女性力量”(Female Power)^{[4]49}。当奥德修斯回到自己的宫殿时,他发现自己不在的那些日子里,妻子的求婚者们一直企图篡夺他的王位。最终,奥德修斯掌握了求婚者们的计划,并成功与佩涅洛佩重逢。显而易见,奥德修斯的旅程是一场神话之旅,而那些转折性的重要经历都与女神有关,这便是《奥德赛》中的“女性法则”:将两性关系重新诠释成共生关系,取代了此前女神衰落期中男性压制女性的模式。

综上所述,古欧洲及近东地区的女神信仰从史前时代到基督教出现,再到当下,存在一条相对清晰并有助于深入探索的脉络,即女神和男神同时出现、女神开始独树一帜、再到女神被男神替代、最后达成女神与男神交互影响之典型范式,经历了诞生期、鼎盛期、衰落期、复兴期四个阶段的线性发展。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种族与文化》中指出,人类文化并不以同一方式,也不在同一层面上有所不同^[5]。和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文化差异的看法不同,坎贝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相似性上。他坚信存在一个普适的神话,即“单一神话”。这种神话是对人类灵性历史一致性的哲学表达,是超越故事的故事。但在陈述其女神信仰发展观时,坎贝尔分析了世界上大部分古典文明的女神信仰,唯独没有探讨中国古典文明背景下的女神信仰,这种纰漏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其自身思想内在结构的否定。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这或许与他在《神的面具》第三卷《东方神话》中的论述有关:正如在周王朝末期被彻底破坏的礼乐制度一般,中国神话也同样呈现零碎的状态,等到“后孔子时代”(Post-Confucian Ages)再次成型,却已失去了神话最原初的意义^[6]。

在坎贝尔看来,中国神话缺乏原始性、完整性与系统性,其中涉及女性的神话自然更加边缘与模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神话学家叶舒宪曾提出疑问:既然西亚、欧洲和中亚都曾经历女神文明阶段,那么,中国文明发生之初是否也曾经历过一个崇拜女神的远古时代呢?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为此问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7]。由此

也证明,中国女性神话具有神话学意义上所强调的原始性。至于完整性与系统性,即使是在西方,以女性神话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是通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多位学者的持续努力建构起来的。这些学者包括巴霍芬、荣格、荣格的弟子诺伊曼、受荣格思想影响较深的坎贝尔,以及致力于神圣女性文物发掘的玛丽加·金芭塔丝^[8]。中国的神话学者们自然也需要经历探寻、归纳与整理的过程,才能揭示出中国原始女神神话暗含于考古文物、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背后的发展源流和谱系,进而纠正和修补中西方比较神话学彼此之间的偏见与疏漏。

三、中国女神信仰发展的三个阶段

事实上,在研究中国原始文化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视角比坎贝尔更加深远。他早已做过将中国原始文化与西方、近东甚至非洲进行比较的尝试。在《原始分类》中,涂尔干写道:“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分类体系与我们先前所研究的分类类型之间建一种历史的联系,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些原始分类都是以相同的原则为基础的。”^[9]荣格认为,相同的分类类型背后是全人类共有的超个性心理基础,即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在不同民族与文化中产生了变形,但始终具有共通性。因此,无论是中国神话体系本身,还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女神信仰,必定具有其普世性意义,可以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全人类产生共鸣,应该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只不过伴随着族群外部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不断变化,中国女神信仰选择了一种与坎贝尔总结出的女神神话发展类似但略有差异的个性化前进方向,形成其独特的神话秩序和神圣女性观。其转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分别是“大母神女娲时期(诞生期)”,“炎黄时代的嫫祖与天女魃时期(衰落期)”,以及“仙话化的西王母时期(复兴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和坎贝尔提出的女神信仰诞生期、鼎盛期、衰落期以及复兴期四个阶段不同,中国女神信仰缺失了女神崇拜的鼎盛期。

(一)大母神时代(诞生期):女娲

《楚辞·天问》中屈原发出询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中国女神女娲,同样是大地之母的化身。坎贝尔认为,最原初的大母神不仅是生育女神,带来生命,接引死亡,还激发人类精神及诗意上的自我实现^{[4]51}。纵观女娲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功绩,即造人和补天,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为中华文明所带来的“生的赞歌”。女娲为天地初开后空旷的华夏大地创造了远古先民,又在华夏先民面对天地动乱时挽大厦于将倾,最终使人类社会重新恢复生机勃勃的景象: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员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10]

面对乐土重现,她亦甚为欢喜,制作了一种名叫“笙簧”的乐器,将它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人类孩子^[11]。等到做完这一切工作,女娲迎来她的死亡。万物之形都是神的身体,这是农业神话的起点,也是终点。所以女娲身为神祇,她的死亡绝不意味其生命的终结,而是转化为《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一种新形态“女娲之肠”,分别化作居于栗广之野的十个神祇^{[12]248}。可以说,作为大母神的女娲确实具备上述理论中所强调的三种功能。

只是和坎贝尔所涉猎的古欧洲及近东地区女神信仰变迁不同,女娲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大母神,实际上从未拥有过一段完全独属于她的崇拜鼎盛期。女娲造人说是为附和盘古开天辟地后人类之出现,之后数千年,无论在书面记载还是画像石刻中,女娲和她的兄长、丈夫伏羲几乎形影不离。女娲之后便是炎黄二帝的时代,中国神话跃过了“女神独树一帜”期,也就是鼎盛期阶段,直接进入“女神被男神替代”的衰落期,大母神形象开始逐渐产生裂变延展。和那些彻底抹杀

女神形象的父权制神话(比如巴比伦马杜克神话)不同,中华文明更倾向于让男神和女神进行婚配,或者让男神成为女神的保护者,抑或反之。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神话的处理方式似乎与中华文明有相似之处。可惜古希腊神话中的同化看上去虽然祛除了来自行为上的暴力,比如杀戮或吞噬女神,却仍旧带有极为强烈的男性审视,这可以看作是对女神形象的刻意忽视与丑化。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女娲时代,无论她是否身为伏羲的妻子,女娲本身始终具有独立的自我特质。“三皇五帝”的说法多样,组合模式各异。但无论组合如何改变,女娲始终是“三皇五帝”概念体系中唯一的女性神祇,其余的伏羲、神农、燧人等皆为男性。她与伏羲平起平坐,既没有成为伏羲的附庸,属于她自己的功绩也从未被掩盖。

(二)妻子与女儿时代(衰落期):嫫祖与天女魃

虽然没有鼎盛期,却不代表不存在衰落期。至炎黄时代,众所周知,黄帝元妃西陵氏嫫祖,作为天后有两项功绩:一是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颡顼^{[12]272};二是学习并推广了养蚕缫丝法:以其始于蚕,故又祀先蚕^[13]。采桑、养蚕再到将其纺织成布匹,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女性赖以生存的劳作活动。除嫫祖之外,黄帝身边还有一位女神形象值得引起注意,即黄帝之女天女魃。相传炎黄时代,黄帝曾与蚩尤爆发过一场极为激烈的大战,史称“涿鹿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黄帝派出名唤应龙的神龙出战,不料应龙却被与蚩尤交好的风伯及雨师吹得立不住脚。黄帝见状,决定命他的女儿魃出战相助应龙。《山海经》这样记载: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12]266}

由此不难看出,包括《山海经》在内的现存古籍中,关于天女魃的记载很少。如今我们仅能知道,天女魃是秃头模样,喜着青衣。战后因其所到之处大旱不止而受到百姓厌恶和驱逐。故事发展至此,其实令人很难理解:天女魃在涿鹿之战中保护了炎黄部落免受蚩尤迫害,然而,她却遭到驱逐。

嫫祖和天女魃留存于古籍中的不甚明晰的形象,清楚地反映了父权文化尝试同化,乃至贬抑女神形象的痕迹。可以说,黄帝妻女的身份消解了嫫祖和天女魃作为个体的价值及其关于自我的一切定义。天后嫫祖虽是女神,但她最为显著的符号编码是“黄帝元妃”,最大的作用也不过是为黄帝诞下子嗣,延续帝族血脉。同为远古大神,她教会中华先民织造布匹、制作衣物以蔽体保暖、延长生命长度,但她在神话中的篇幅却远远少于丈夫黄帝,甚至少于丈夫麾下的诸多男性大臣。至于天女魃,处境比之嫫祖更为艰难。身为立下赫赫战功的女英雄,她承继了大母神女娲炼石补天、守护族群的精神,但在当时的男性审视下,神话中却只记录下她相貌丑陋,她击败风神和雨神的强大力量变成了带来旱灾的不祥之力,被百姓嫌恶,不断地被驱逐,致使居无定所。正如坎贝尔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以当今视野对女神信仰衰落时期所出现的神话传说进行重新反思,在那一时期所呈现的对待女性的方式,根本不是两性对话中应当持有的态度。虽然坎贝尔庞大的女神神话体系并没有将中国女神信仰纳入其中,但中国女神信仰确实同样经历了父权统治下的无奈衰落。

(三)女仙之首时代(复兴期):西王母

如果把炎黄时代看作中国远古女神的衰落期阶段,那么,随着中国神话汲取道家仙话元素不断发生变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女神信仰又在西王母的引领下迈上复兴之路。《山海

经》只说西王母是一个“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12]41}的怪兽;到了战国时代成书的《穆天子传》则写西王母自述其“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14],表明了西王母的“帝女”身份,也指出其生活状态的优雅欢乐,但并未提及西王母外貌如何。至于西王母形象的真正完善,应该是在《汉武帝内传》中形容她“容眸流陌莫见切,裹视也,作盼非,神姿清发,真美人也”^[15]。此时既已确立了西王母的女性特征,民间索性又给她添加了一位配偶东王公^①。后来,道教仙话谱系中尊东王公为男仙之首,西王母为女仙之首,他们两人也就发展成为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在谈及女神变化的奥秘时,坎贝尔认为,女神的重要性不在于女性一定得返回母系社会成为最高统治者,而是能够保持女性本身的特质,其存在与感知也能被公正地理解和接受^{[4]221}。通过整理西王母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出,西王母与形貌丑陋又遭人厌恶的天女魃不同,也与作为黄帝附属品的嫫祖不同,她始终保持着自我特质,作为女神,不仅能够与男神东王公并肩领受来自民间的香火供奉,也能够作为独立的女性神祇,多层面地接受民间对其个人的宗教崇拜。概言之,西王母走过从“怪兽”到“仅有模糊形象的天帝之女”的一段经历,经历漫长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才逐渐成为和配偶身份平等、共享香火的一方女神。

从初现至今,西王母形象的改变其实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神话的仙话化。相比较世界其他文明中的神话发展,由于道教在东汉末年逐渐形成,中国神话随即开始受到其影响,仙话化已然成为中国神话区别于其他地区神话非常独特的因素之一。道教是道家精神所衍生之产物,《老子》《庄子》等经典自然成为道教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叶舒宪曾在《〈老子〉与神话》中提到大母神原型在老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16]。坎贝尔在了解到关于‘道’的概念后,也认为“道”涉及的是超越个人的整体宇宙观,阴与阳不是对立的系统,正如男性与女性亦不存在所谓绝对对立,所以中国神话常常会表现出超越性别的状态。西王母作为道家精神所塑造的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女神,承继了《老子》原初思想中蕴含的大母神崇拜,方能在仙话化的助力下推动女娲之后女神信仰的回归与复兴。

需要注意的是,道家仙话与“长生不老”崇拜密不可分,西王母则是这种崇拜的具象化。在这里,不得不再次回到女娲时代。虽然女娲和“长生不老”崇拜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和女娲有关的传说中,却已经涉及中国远古先民对生与死概念的思考,如上文关于女娲时代中国神话信仰的论述提到了女娲死后化作栗广之野十个神祇的记载。尽管那时还没有“长生不老”之说,但在相关的神话叙事中,通过神格形态的转变来对抗神的死亡又何尝不是追求“长生不老”的一种体现呢?

由此,可以引出第二个原因,即儒家对中国神话的介入。包括坎贝尔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重视现世的思维模式必然会削弱神话想象中所蕴含的超脱凡尘的精神追求。由于孔子重视入世并强调现世得失,使得华夏民族自儒学兴盛以来很少再关注如何面对死亡。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17]的观念中,我们也可以认为,儒家不断强化生的概念,其实也是“长生不老”崇拜的变体。在道学与儒学的共同作用下,“长生不老”逐渐取代了原始神话中“神陨”的意象。“神陨”对死亡的表现形式,也逐渐为社会所遗忘。而在诸多“长生不老”的神话故事中,萧统《文选·祭颜光禄文》引《周易·归藏》,讲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故事,说明西王母是最早掌握长生药的女神,“长生药”奠定了西王母信仰的群众基础,也是使其成为杂糅道与儒、超越生与死边界的至高形象的关键。

不仅如此,在对比苏美尔神话中的伊什塔尔和埃及神话中的伊西斯时,会发现西王母缺少一

① 《神异经》汉魏丛书版可见“东王公”记载,四库全书版已不可考。

段经典的神话母题:女神前往地狱寻找她失去的配偶或爱人,透过忠贞与死亡,最后成为对方的救赎者。女神救夫的神话内容是古老传统的重要基础,强调女神不仅孕育人类的身体,更是人类精神力量的真正源泉。首先,这是因为西王母及其丈夫作为最高神祇已经拥有了长生,根本不会面临死亡后堕入地狱的威胁。其次,女神前往地狱寻找爱人是一种精神性的爱欲追求。但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体系内,神存在的意义是为现世服务,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而非满足其个体的需要。这也正是为何在中国神话体系中西王母先于东王公出现,并且即便在东王公成为其配偶之后西王母依然能够独立存在、接受香火供奉。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神话成文的年代比其他文明晚,人们已经很难考证到底是先有长生女神形象的西王母,还是因为道家仙话试图附会神话才产生了这一形象。但无论如何,相比于西方女神神话较为温和的复兴期,以西王母作为复兴期女神代表的中国神话明显更加强势,她甚至至今仍以完整丰满的女神形象活跃在当代中国的女神信仰范围之内。

在《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中,张隆溪强调了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理论时应有的态度。他写道:“我们应该熟悉西方理论,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其背景和必有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在把握事实和文献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不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处理东西方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对研究和学术作出贡献。”^[18]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只有始终贯彻这一原则,才能真正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为当今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坎贝尔提出的西方女神神话发展结构中,全世界的女神神话在变化过程中都存在相同之处。通过对中国古典女神神话进行阐释,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西方女神神话体系的特殊性。对于任何文化而言,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总是同时存在,所以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无论是求同还是求异,都必须以客观、全面、合理的态度展开阐释,不可轻易断言。这是坎贝尔理论的疏漏,也是本文试图对其进行修正之处。

此外,任何理论的价值都不会止步于它诞生的时代。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研究古老女性神话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与神学家卡罗尔·P. 克里斯特认为,当代女性需要女神是因为女神象征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承认女性权力作为一种仁慈和独立的权力的合法性^[19]。女性必须意识到,人类社会并不只属于男性,也属于女性,这一真理自神话诞生之初便已存在。正如坎贝尔所言,其实女性和男性之间从古至今都不是竞争关系,反而适合彼此合作、彼此支持,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所以现代男权社会完全不应该扼杀女性融入社会并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女性当然也需要尽早觉醒,努力争取应得的权利。

每个伟大文明都是以神话为根基成长起来的,古老神话为全人类提供了支撑力量,让整个文化世界相互交融,避免四分五裂。借助神话对现实的反射,重新看待和平衡两性关系,帮助当代女性跨越时间和空间与远古神圣力量进行对话,正是远古神话流传至今的重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坎贝尔,莫耶斯. 神话的力量[M]. 朱侃如,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57.
- [2] FRYE N.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33.
- [3] 坎贝尔. 千面英雄[M]. 朱侃如,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349.
- [4] 坎贝尔. 千面女神[M]. 黄悦,杨诗卉,李梦鸽,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 [5] 列维-施特劳斯. 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M]. 于秀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
- [6] CAMPBELL J. The masks of God: Volume II: oriental mythology[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2:381.
- [7] 叶舒宪,谭佳. 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83.

- [8] NEUMANN E.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5.
- [9] 涂尔干, 莫斯. 原始分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61.
- [10] 淮南子[M]. 陈广忠,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323.
- [11] 李昉. 太平御览[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365.
- [12] 山海经[M]. 方韬,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3] 罗泌. 路史:后纪卷五[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89.
- [14] 穆天子传译注; 燕丹子译注[M]. 王天海,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80.
- [15] 班固. 汉武帝内传[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5:2.
- [16] 叶舒宪. 老子与神话[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171.
- [1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113.
- [18] 张隆溪. 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13.
- [19] CAROL P C. Why women need the goddess in women's studies in religion[M]. London: Routledge, 2017:166.

On Joseph Campbell's Female Mythology: Based on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Development

YAO Mengjie^{1,2}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r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94720, U.S.A.)

Abstract: Joseph Campbell, by organizing and summarizing myths, legends, stories, and sacred belief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elaborated in detail the evolution of goddess mythology worldwide. He described a continuous, linear progression of four stages: the birth, the heyday, the degradation, and the return.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historical, and other unique factors,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developed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aligns broadly with Campbell's goddess theory on a macro level,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pecifically, by examining the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of figures like Nü Wa, Leizu, Nü Ba, and the Xiwangmu,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does not entirely follow Campbell's four-stage progression. Instead, it follows a three-stage evolution that lacks the degradation period. Thu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expand and refine Campbell's theory, offering a means of drawing strength from ancient myth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society better.

Key words: Joseph Campbell; mythology; goddess belief; Chinese myth

〔责任编辑:何敏敏〕